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中国与联合国



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结束后，一位爱国志士画了一幅中国疆域的《时局图》：

在地图的上部，有一只硕大无比的北极熊，它的胯下是中国北方蒙古、满洲等地区，它的四肢则伸向山西、辽东和直隶诸省，眼睛却紧盯着中原地区；在地图的中部，横扑着一只凶猛的老虎，它的尾部搭在威海卫，前爪则扑向广西，腹下是广阔的长江流域；在地图的下部，蹲着一只扬肢鼓腹的大青蛙，它的身子伏在越南的领土上，左前肢则伸入云南、广西，右前肢则攀住海南岛；在地图的北上部，即日本列岛位置上，一轮光芒四射的太阳像蜘蛛般吐出一根黑线，直下西南，紧紧地缠住了台湾岛，它的触角则越过台湾海峡伸向福建；在地图的中上部的山东半岛上，则曲盘着一圈肥肠似的怪物；在地图的左下方的海面上，一只饥饿的秃鹰正伸嘴探爪展翅飞越大平洋，经菲律宾岛向中国大陆急扑而来。

在这幅《时局图》中，那虎踞朔方的北极熊，横扑在长江流域的猛虎，蹲坐在西南边陲的毒蛙，曲盘在山东半岛的一圈肥肠似的怪物，以及升自东瀛列岛的太阳和来自太平洋的秃鹰，分别代表了俄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美国，把列强瓜分中国的态势描绘得赤裸裸活脱脱，令人猛醒！

半个世纪的悠悠岁月过去了，历史进入了1945年。50年前参与瓜分中国的日本、德国已成为可耻的战败国，另一些参与者如英、美等国，则不得不同50年前的被瓜分者——中国平等地坐在了一张圆桌前，运筹帷幄，呼唤世界风云。

这一天，不仅是中国人民喜庆的日子，也是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难以忘怀的日子。

这一天是1945年10月24日，人们通常称之为“联合国日”。

一、中国抗战：一幅血肉描绘的 悲壮雄伟的画卷

1840年，英国人带着罪恶的鸦片登上中国海岸后，虽对古老的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但是并没有完全惊醒这头沉睡中的东方雄狮。惊梦的国人发出的强国的呐喊，在死气沉沉的旧框框旧套路中弱于游丝；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在甲午战争中葬身鱼腹；酝酿已久的富国强兵的戊戌维新，被紫禁城的那个奸诈狠毒的慈禧扼杀在襁褓之中。此后，虽然革命家孙中山在南方联络仁人志士，拯救祖国于危难之秋，并激起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辛亥风云，但是，这些文弱书生的满腔热血，敌不过袁世凯的新军和权谋。袁世凯上演了一幕逼宫戏、圆了83天皇帝梦后，中国依然国势不振，陷入军阀混战之中。

几乎与此同时，中国东方一海之隔的东瀛岛国日本，在经历了明治维新后，却羽毛丰满，军国主义狂兴，拉开了“欲想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中国）”的“大陆政策”的序幕。积弱积贫的满清王朝，军阀割据的中华民国，成了大和武士的俎上肉。

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中国东北投下了一颗炸弹，并做起了“速战速决”拿下中国的美梦。但是，日本的这个如意算盘却打错了。10年前在嘉兴南湖一条小船上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已自觉地担负起拯救中国的神圣职责；打破军阀割据后建立起来的国民政府，也拥有了较强大的军队。况且，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虽然是短暂的，却给人民留下了外御强侮、内思统一的共识。自1840年以来任人践踏、任人宰割的屈辱的历史，已成为萦绕心头久久不散的血泪悲歌，中国人民决不允许历史重演。“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即号召全国人民肩负起保家卫国的神圣职责，并表达了与国民政府携手合作的民族大义。虽然国民政府在早期奉行着“不抵抗主义”的政策，但是，随着战局的发展，国民政府的态度也在逐渐转变。特别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继而发生了“七·七”事变之后，国共两党终于达成了“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共识。此后，中华大地上燃起了抗日卫国的烽火。

在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国民政府军调动大量的兵力，在华北、华东、华中与日寇展开血战。这些战役虽大都以节节撤退而告终，但是，对抗战初期的战略防御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共产党的敌后战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开辟根据地，牵制消灭敌人，使日寇葬身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不屈的中国人，用自己的血肉，描绘了一幅悲壮雄伟的画卷，演奏了一支激荡心扉催人奋发的劲歌！

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所产生的巨大的能量，不但粉碎了日本“速战速决”鲸吞中国的狂妄计划，而且引起了世界的注目。中国以其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不可替代的地位，成为美英苏等国所必须依援的对象。

二、“黑色的星期日”后的世界局势

如果把二战时期具有转折意义的日子进行排列的话，1941年12月7日决不是可以忽略的。

在这个被美国人称之为“黑色星期日”的上午7时55分，从日本航空母舰上起飞的190架飞机，对美国夏威夷珍珠港的海军基地进行了摧毁性的攻击。正在度假的美国士兵除了躲避死神外，难以有所作为。接着，不容美军有任何喘息的机会，日本又出动了170架飞机进行了第二次攻击。连续两个小时的空袭，使珍珠港的海防力量损失殆尽。一位英国陆军部的官员在事后颇有风趣地描绘美国当时的窘况：“美国是在光着屁股解手时挨打的，而且手头连一张手纸都没有。”

日本的偷袭，粉碎了罗斯福对日本的种种幻想，放弃了中日战争爆发以来所玩弄的平衡木的游戏。12月8日下午6时30分，罗斯福总统向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宣读文告，决定统帅美国对日宣战。与此同时，又向德国和意大利递上宣战书。

同一天，英国也对日宣战。

与美国的愤怒相反，12月8日，在重庆的国民政府得知这一消息后，却兴高采烈、弹冠相庆。他们仿佛从珍珠港的硝烟中看到了未来的希望：有了美国这个强大的盟国，中国一定能很快打败日本。中央社立即刊印号外，到处散发。重庆市民也纷纷涌向街头，相互传递消息。人们甚至盛传美国已经出动500架飞机轰炸了东京。

国民党立即召开中央常务委员特别会议，讨论中国对今后世界战局的方针。同一天，蒋介石召见英美驻重庆代表，建议美、英、中、荷（兰）、苏缔结军事互助条约，并在重庆建立一个以美国为首的军事委员会，协调各国的军事行动。12月9日，国民政府代表中国向日本及德意宣战。10日，蒋介石发表了《告全国军民书》。文中说道：

“吾全国同胞自今伊始，更须紧张严肃，各竭其能，各尽其责，共作最大最后之奋斗。吾海外侨胞，应尽其赤诚，奋其伟力，各就所在地区，贡献所有力量；协助友邦，消灭共同之公敌，造成祖国之荣誉。吾全国之将士，更应切认今日为吾军人奋勉图报惟一重要之时机，亦为国家民族存亡荣誉之关头，宜更沉着坚忍、英勇奋发，以获‘九·一八’以来血肉所造成的战果。”

12月9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宣言指出：“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应该继续过去五年的光荣战争，坚决站在反法西斯国家方面，动员自己的一切力量，为最后打倒日本法西斯而斗争。”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宣言》提出了“中国与英美及其它抗日诸友邦缔结军事同盟，实行配合作战，同时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日战争至完全的胜利”等八项重要任务。

“黑色的星期日”后，国共两党所发表的中国对今后世界战局的方针，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使中国人民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洪流中，并在其中进一步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罗斯福对儿子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塌了……”

1942年，美国总统罗斯福曾对他的儿子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塌了，你想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到中东。”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世界局势而言，罗斯福这番话绝不是危言耸听。

“黑色的星期日”以后，日军的作战方向是：第一阶段南进，占领关岛，登陆菲律宾，征服马来西亚，侵占香港，巩固对中国东部沿海的占领；再西向进攻缅甸、新加坡，向南侧击澳大利亚，进攻印尼，占领南太平洋各群岛。第二阶段，完成上述作战目标后，集中力量巩固大陆的占领，完成从上海到新加坡的大陆控制。被日本计划所归于“大东亚秩序圈”的这些国家和地区中，几乎都是英美荷等国在这一地区的岛屿和殖民地。很显然，日本的作战目标除中国外，已对准了英美。从当时的军事力量对比来看，日本的海军力量相当于美英荷驻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力量的总和；日陆军有51个师团，其中在中国东北有13个师团，长城以南有21个师团，能用于东南亚和太平洋西南地区作战的现役师团有11个。中国共牵制了日本陆军34个师团，相当于美英等国牵制日军的3倍，占其全部陆军的66.6%。这一统计数字表明：美英帝国在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如果失去了中国战场的配合，其对日作战的进程是难以想象的。无怪乎罗斯福要发出如此的感叹了。

尽管傲慢的英帝国对亚洲的了解很有限，并且一直对中国怀有深深的偏见，这时候也对中国改变了看法。当时驻英大使顾维钧回忆说：“丘吉尔访美后在下院说，中国差不多是赤手空拳地进行了4年半的抗日战争。丘吉尔内阁的飞机生产大臣比弗布鲁克勋爵此刻对中国人的英勇战斗赞不绝口。他说英国人过去认为日本人很坚强勇敢，可是中国人却以极少的武器，或者说根本没有武器，硬是把日本打得欲进不能。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说，中国人一定是比日本更为骁勇善战。”此后印缅战役中英军的溃逃和中国远征军的奋进的巨大反差证明，英国人的这种看法是不无根据的。

正因为基于这样的认识，英美在确立“欧洲第一”的战略重心时是以这两个要点为前提的：第一、在亚洲拉住中国，顶住日本；第二、在欧洲拉住苏联，集中主力打击德国。而中国和苏联面对法西斯轴心国在全球的挑战，则希望反法西斯的各同盟国协同作战。

1941年12月16日，罗斯福接受蒋介石的建议，决定定期在重庆召开盟国的联合军事会议，以实现军事联盟。18日，美国派定米尼兹上将为太平洋舰队总司令。23日，英国印度军总司令、美英荷澳远东战线最高司令官魏菲尔，美国陆军航空队人勃勒特等，参加在重庆举行的军事联席会议，这是重庆政府与西方盟国远东最高司令官的首次会议。蒋介石在这次会议上，从中国的利益出发，提出了对法西斯作战的先亚后欧战略方针。但是，在26日英美两国三军参谋长举行的阿卡迪亚会议上，英美则从自身的利益出发，确定“欧洲第一”的战略。

根据英美的这一战略，将全球划分为4大战区：欧洲大陆战区；北大西洋战区；北非中东战区；太平洋战区。这一战略的背后，也暗示出了美、英、苏、中4大强国的座次。

1942年元旦，丘吉尔在加拿大国会发表演说，宣称将团结30个以上的国家共同作战。同时，对中国和苏联在这场战争中的伟大贡献给予充分的肯定。

同一天，美、英、苏、中等26国向世界法西斯发出了反击的宣言：

“签字国政府，对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首相于1941年8月14日发表的联合声明，即众所周知的《大西洋宪章》所体现的宗旨和原则的共同纲领业已表示赞同；

深信完全战胜它们的敌国，对于保卫生命、自由、独立和宗教自由，以及对于维护本国和其它国家的人权和正义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它们现在正对力图征服世界的野蛮和残暴的势力进行共同的斗争；兹宣布：

每一政府各自保证使用其全部军事资源或经济资源来抵御同各该政府交战的三国公约成员国及其附庸国。

每一政府各自保证同本宣言签字国合作，保证不同敌人单独停战或和谈。现在正在或可能在战胜希特勒主义的斗争中提供物质援助和贡献的其它国家均可在上述宣言中签字。”

《二十六国宣言》第一次提出了“联合国”一词，并成为后来联合国的雏形。

在美、英、苏、中在宣言上签字的顺序上，有一段不太为人注意的小插曲：罗斯福开始将中国列于美国之后，居第二位，英国和苏联居第三、第四，其它国家以英文的第一个字母为序。而当宣言发表时，罗斯福却接受丘吉尔的意见，以美、英、苏、中为序。

虽然如此，中国毕竟进入了世界四强之林。但是，这段小小插曲，却既表露了美国使“中国成为强大的国家”的真实意图，也提示出了美、英在远东问题上的龌龊。当然这是后话，且按下不提。

根据阿卡迪亚会议的精神，盟国在太平洋战场上划分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泰国、越南及将来盟军可能控制的亚洲大陆为中国战区，由蒋介石任最高统帅。美国推荐史迪威将军为中国战区盟军参谋长，英国驻华武官丹尼斯少将改任驻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3月2日，美国宣布以麦克阿瑟为盟军西南太平洋最高统帅，在澳大利亚建立总司令部；魏菲尔任印度军总司令兼指挥缅甸守军作战与中国军队合作，在印度建立对日军作战基地。3月10日，美国决定将空军少将陈纳德的志愿航空队正式改编为驻中国第14航空队。3月31日，同盟国在华盛顿举行太平洋作战会议，以熊斌为团长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参加了会议。中国战区成为同盟国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总体制计划的一部分。

四、中英中美新约：百年来 中国人民奋斗的结晶

曾几何时，国民政府为“黑色的星期日”后会给它送来源源不断的美国租借物资而高兴，岂料英美所确定的欧战第一的原则，使得英国虎在美国鹰眼中成为一只得宠的花猫，把本来属于国民政府的物资大半掠走。蒋介石虽然当上了太平洋战场中国战区最高长官，但有一个美国派来的史迪威在身边，给他找来不少麻烦，而且联军之间为各自保存势力互相指责所发生的齟齬也足以令他恼火。更不能让蒋介石忍受的是，美英并没有把中国看成是平等的盟友，只是在利用中国的力量为其战略服务。美英制定了大西洋宪章，但并不制定一个反对殖民主义的太平洋宪章。而且，在盟国头头召开的战略会议上，中国往往得不到一张入场券，甚至连盟国在华盛顿召开的、由租借物资分配委员会成员国参加的联合参谋长会议，也将属于成员国的中国拒之门外。为了改变这种局面，蒋介石一方面将自己的不满通过史迪威向罗斯福发泄，另一方面寻找机会同美国摊牌。

1942年6月，美国为了紧急援助被德军紧逼的英国，将停在喀土穆机场的准备飞往中国的一队B-24轰炸机，改调由英军支配。这使蒋介石再也忍无可忍了。他在给罗斯福的信中强硬地说，既然英国每遭受一次失败都要拿走一份支援中国的物资，那么中国就没有必要再打下去，如果英美认为中国作为一个战区还有必要的话，那么，中国就应当与英国的地位平等，有权自主地支配给中国的租借物资，而不能总是受制于美国。为此，蒋介石向罗斯福明确提出了三个条件：“1、美国于8、9月间调陆军3个师到印度，以重新打通经缅甸到中国的交通线。2、自8月起，美国从中国出动的作战飞机要达到500架，而且以后保持这个数目。3、空运到中国的作战物资每月保持5000吨的运输量。”否则，蒋介石威胁道，将取消中国战区。

罗斯福早已明白“假如没有中国”的道理，当然不想丢掉中国战区和蒋介石，但是他也不想改变为“欧洲第一”的战略而优先援助英国的既定之策。因此，他在给蒋介石的回函中，既满口答应这些要求，又婉转地解释目前尚有困难，请再坚持等待。尽管这些要求被美国大大地打了折扣，作为既不想也不敢与美国闹翻，更不想取消中国战区的蒋介石，也就不再说甚么了。

自中国以自己的力量被承认为反法西斯4强之后，国民政府即向英美提出要求，希望能废除对中国的平等条约，给中国以真正的平等。虽然英美一开始对此无动于衷，但是，随着世界战局的发展，英美感到只有中国支撑住亚洲，它们才能完成“欧洲第一”的战略。于是，它们才同意废除对中国的平等条约，放弃在华的特权，重订与中国关系的新约。经过国民政府的力争，1943年1月11日，“中美平等新约”在华盛顿签字，“中英平等新约”在重庆签字，美英两国正式宣布废除在中国的特权，即自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以来英美历次与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所享有的特权。

中美、中英新约的公布，无论是在陪都重庆，还是在革命圣地延安，都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庆祝活动。1月12日，蒋介石发表《告全中国军民书》声称从此中国已经是完全独立的、与英美苏平等的世界强国了，并要求全国军民“奋发图强”，服从国民党的一党领导；《中央日报》以“平等、自由的光明灯塔”为题发表社论，强调了国民党的“英明”领袖蒋介石的“伟大”；三青团发表《告全国青年书》，称：“感戴领袖，永矢忠贞。”国民政府一

些人也都按“感戴领袖”的这一基调，把庆祝活动变成了对国民党及蒋介石的无限吹捧。

毋庸置疑，新约的签定，特权的废除，是中国人民近一个世纪以来不屈不挠，前仆后继，流血牺牲换来的，但是，英美宣布废除的特权，都还在日本手里，对于中国人民而言，还不是实际得到的东西，更何况香港九龙的主权问题，在条约中根本没有提及。所以，国民政府利用这一件事为它的政治服务还为时过早，更何况，废约的成功恰如中国共产党所指出的那样：“是全国人民努力奋斗的结果。人民惟有人民，乃是这一光荣史诗的作者”。

在与英、美商讨签定新约的同时。蒋介石又派宋美龄在美国逗留7个月。这期间，她三次访问白宫，与罗斯福、霍普金斯、陆军部长史汀生、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李海上将都有过接触。她代表中国政府提出战后举行“四强会议”的倡议，呼吁盟国在战后建立永久和平的秩序，并敦促美国采取行动。与此同时，为了唤起美国朝野各界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宋美龄还在各种场合发表演说，介绍中国抗战的形势，盛赞中美之间的友谊。由于宋美龄是在“山姆大叔”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政治家，因而她的演说抓住了美国人的心理，赢得了美国民众的好感。美国民众纷纷为中国募捐，掀起了声援中国的热潮。

五、罗斯福对艾登说：美国准备尽一切可能加强中国

二战时期任美国国务卿的科德尔·赫尔在写回忆录时，回顾了美国战时的对华政策：“对中国，我们有两个目标：首先是有效地联合进行战争；其次是承认和使中国成为一个在战时和战后都与俄国、英国、美国三大西方盟国具有平等地位的大国，这既是为战后的国际组织作准备，也是为了在东方建立稳定和繁荣。”

“黑色的星期日”后，美国投身到世界反法西斯的行列，与中国相互支援，共同战斗，这既是当时的世界政局所使然，也是中国人民抗击日本的力量结果。因此，赫尔所言的战时对华政策的第一个目标得以实现，是合乎情理的。相比之下，美国的第二个目标，则颇令人费解。要对此做出合乎情理的解释，必须从美国对华政策的渊源说起。

早在19世纪，美国的政治家们即对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中国有诸多的了解，当时的政治家们就曾预言，“谁了解中国谁就能执今后500年世界政治之牛耳”。1898年，曾任驻华公使的贝尔就毫不忌讳地坦称：“全世界都把中国看成我们所出产的货物的大好市场。在我们面前有着灿烂的前景，它将使太平洋比起大西洋来对我们更显重要。”正因为如此，美国始终把对中国的控制，作为一个重要的目标。当美、西战争结束后，美国便扛着“代表了最广泛的自由、最纯洁的基督教和最广泛文明”的星条旗，越过太平洋，直奔中国而来。

正当美国准备在中国大干一场之际，却与正在中国掀起割地狂潮的英、俄等列强们碰了个正着。在英国、俄国等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控制之下，美国的势力一直难以渗透进中国。在对中国的“伟大梦想”即将成为泡影时，为了弥补实力与目标的巨大差距，美国抛出了臭名昭著的“门户开放”政策。这个被世人讥之为“顺便搭车”的政策，使美国几乎从列强向中国勒索到的每一份财富中都分得一杯羹。

正当美国利用这一政策作跳板，努力在中国实现殖民野心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一夜之间，美国苦心经营的华盛顿体系便被搅得乱七八糟。此后，伴随着日本由东北而华北，由华北而沿海的步步深入，日本独霸中国的野心，不但使美国在中国的利益最终也将被日本挤出中国大门之外，而且打破了英国企图控制中国的旧格局。因此，当美国在“有效地联合中国进行战争”时，即在硝烟弥漫的火光中，看到了它的前贤们所预言的“执世界500年政治之牛耳”的前景。因此，它在致力于粉碎“大东亚秩序圈”的同时，也致力于进行控制中国、并通过中国控制远东的计划。而要实现这一计划，则既要防止苏联在战后“从亚洲东部向外扩张”，又要控制英国等列强的殖民地遗产。发生在26国宣言签名时的那一段小小的插曲，即已说明英国已然看到了美国这种政策的端倪。这种端倪在1943年初即已形成了一项新的对华政策，亦即赫尔所言的第二个目标，概括起来说就是“使中国成为强大的国家”。

1942年10月，丘吉尔就英外交部草拟的一份关于战后世界设想的文件写信给外相艾登，在谈到中国时说：“我不认为重庆政府能代表一个伟大的世界强国。美国方面肯定会用‘收买无资格投票人，使他具有选民资格，来为自己投票出力的办法，瓦解不列颠的海外帝国’”。因此，当1943年3

月，罗斯福对正在华盛顿访问的英国外相艾登表露了“美国准备尽一切可能加强中国”的意思后，艾登立即表示，英国“不那么喜欢中国在太平洋地区跑上跑下的想法”。后来丘吉尔则更毫不含糊地说：“如果把中国当作名副其实的4强之一，那真是笑话。”1943年5月，丘吉尔访问美国，他在发表的关于战后机构的演说中提到了战后应由美、英、俄成立一个联合组织时说：“如果美国愿意把中国包括在这三国的联合组织之内，他并不反对”，但是，不管中国多么重要，它不能与其它三国相比”。在谈到战后远东问题时，他以中国的救世主的姿态说，英国只派一部分兵力到远东，而用不着使用全部的兵力去“挽救”中国。丘吉尔所用的“挽救”一词，既表露了英国想在战后继续控制中国的野心，也是对中国的有意轻蔑。丘吉尔演说中的藐视中国的立场，引起了中国政府的极度反感。当时正在美国访问的宋美龄对此做出及时的反应。她说：“有若干人士之主张，对于战后各民族更密切之合作，不啻树立障碍，而犹自以为高明。”1943年8月，罗斯福与丘吉尔举行第一次魁北克会议时，虽然在罗斯福的说服下，丘吉尔终于放弃了反对中国作为4大国之一的立场，同意他的“战后以美、英、苏、中为中心，设立国际和平机构”的建议，但是，实际上“英国总是不愿意中国成为强国”。

与此同时，苏联也对美国企图在战后控制中国、并进而控制远东的政策进行抵制。1943年10月，美国军政领导在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即将召开之前，开会讨论可能遇到的问题。会议前夕，美国代表赫尔向苏联代表莫洛托夫转达了魁北克会议英国同意“战后以美、英、苏、中为中心，设立国际和平机构”的建议后，遭到了苏联的反对。当罗斯福得知苏方的态度后，他指示赫尔，在会上要极力坚持四强观念，签署任何协议必须包括中国，“哪怕这个时候达不成协议也在所不惜”。10月19日，美英苏三国外长举行莫斯科会议。会上，赫尔提出应由四国签署宣言，而莫洛托夫则坚持只讨论三国宣言。赫尔坚持己见说：“在我看来，不能把中国从四国宣言中删去。我的政府认为，现在如果俄国、大不列颠和美国在宣言中把它抛到一边，那在太平洋地区很可能要造成可怕的政治和军事反响。”在此建议不被苏联接受的情况下，赫尔直言不讳地说，如果宣言不以四国的名义签署，美国绝不会在一份三国宣言上签字；而且，如果苏方坚持拒绝邀请中国，他将不签署任何文件而离开莫斯科。在美国的这种强硬的态度下，苏联被迫改变了主张，同意以四国名义发表宣言。但是随后苏联又以中国无代表在此为借口，建议仍由苏、美、英三国签名。赫尔仍坚持必须由四国代表签字，并提出让中国驻苏大使代表签字。26日，当时的驻苏大使傅秉常在会见赫尔后，立即电请蒋介石，授权他作为中国代表签字，27日蒋介石复电批准。30日，傅秉常与美、英、苏三国外长共同签署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四国宣言。

这个后来被称为联合国组织最初蓝图的《普遍安全宣言》称：“美英苏中政府根据1942年元旦之联合国宣言及其后各项宣言所共同决定，各向其现与作战之轴心国家进行战争，直至此种国家在无条件的投降屈服为止之决心。且鉴于为其本身与其为与国对于侵略之威胁谋得解放所负之责任，并鉴于战争至和平其演变必须迅速而有秩序，且为建立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全世界人类及资源用于武装者可达最低限之起见，用特联合宣言。”其中规定：“在重新恢复法律秩序与成立普遍安全制度之前，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起见，彼等得随时会商，并于必要时与其他国家商议，以代表国际社会采取共同行动。”这样，就确定了四国共同对法西斯国家作战，共同结束战争，共同组

织世界和平组织及维护战后世界和平的原则。宣言“根据一切爱好和平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并进而勾画出了这一新国际组织的轮廓：第一、凡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无论大小，均得加入为会员国，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第二、未来组织的基础是根据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第三、未来组织的宗旨是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四国宣言”的签定，迈出了筹建联合国组织的关键性的一步。

莫斯科外长会议结束后，美国既然促使英苏至少在形式上接受了它的政策，下一步就是把蒋介石拉进四国首脑会议了。

筹备四国首脑会议时，因苏联尚未加入对日作战，不便与中国同席讨论对日问题。这样一来，四国首脑会议只好分两段进行：首先在开罗举行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会议，称开罗会议；然后在德黑兰举行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会议，称德黑兰会议。

11月22日至26日，开罗会议举行。这是大战爆发以来中国政府首脑第一次参加最高级国际会议，蒋介石终于圆了孜孜以求之的“强国梦”。会议期间，蒋介石就建立战后强有力的国际和平机构问题分别与罗斯福、丘吉尔交换了意见，表达了希望“四国宣言”早日具体化的愿望，他表示，“中国将欣然参加四强的一切机构和参与制订决定”。

事实上，在赴开罗会议之前，蒋介石即指示手下对战后的国际机构准备方案。因此，在中国代表团为参加开罗会议事先拟定的多项问题草案中，关于战后和平问题占有重要分量。到开罗后，中方又将政治方面的提案，分成四项节略，翻译成英文，交蒋介石审阅。在提案的第一项，就是“设立四国机构或联合国机构问题”，内容为：（1）在联合国总机构未能设立以前，应由美、英、苏、中四国及早成立四国机构，以便协商关于四国宣言所规定之事项；（2）上述四国机构之经常之机关，设于华盛顿，但有时也可在伦敦、重庆或莫斯科开会；（3）四国机构应负责筹设联合国总机构；（4）联合国总机构之组织，中国政府赞同美国政府所拟由11国组成一个执行机关，由美、英、苏、中四国任主席团之办法。蒋介石看后，指示代表团秘书长王宠惠将此节内容转交了罗斯福。

开罗会议公布的会议公报，肯定了中国的四强地位，宣布日本从中国夺取的一切领土，战后必须归还中国。此外，罗斯福蒋介石还就美国援华、中苏边界及远东其它国家的一系列问题交换了意见。

开罗会议结束后，美国与国民政府确定了双方在远东的战略关系，罗斯福蒋介石为他们取得外交成就弹冠相庆：国民党《中央日报》的社论称开罗会议是“转移了世界人类的命运，重写了世界历史的新页”；罗斯福则在圣诞节前夕发表致美国人民书，宣布美国和中国“在深厚的友谊和统一的目的上，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密切”，美国国会同时宣布废除歧视华人法律，以便进一步证明美国“不仅视中国为战争中的伙伴，而且将视中国为和平时期的伙伴”。

但是此后不久，罗斯福便对他的这位伙伴感到不满。在罗斯福着手实行他的“使中国成为强大的国家”的政策的同时，美国的一些“中国通”们——驻华的戴维斯、谢伟思之类的外交官，便开始研究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能否担当得起这个“强大的国家”的领导者。研究的结果使他们发现，罗斯福所依赖的国民政府是一个既不愿积极同日本打仗，又不统一、也不民主的“极端腐败”的政权，这个政权将来与生机勃勃的中共政权打内战时很可能是一

个失败者。毫无疑问，“中国通”们的研究报告肯定在美国的决策者中间产生了影响，美国政府开始了调处国共矛盾的努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一个个特使轮番出现在中国的台上。但是，由于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在恶性循环中转圈，这些特使们尽管使出了浑身解数，也不可能有多大作为。最后，美国政府只好下赌注了，走上了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道路。

美国想依靠蒋介石实现其“伟大的梦想”的愿望，真的只是梦想了。

六、董必武说：“我虽系共产党之一员，然系代表整个中国。”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了具有决定意义的转变。中、美、英、苏四国所签署的《普遍安全宣言》所提出的建立国际和平机构的设想，便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1944年5月，罗斯福向英、苏、中三国发出邀请，近期在华盛顿共商建立国际和平机构的有关事宜。蒋介石当即致电罗斯福，表示中国向来主张早日成立。战后国际和平机构如果可能，并望在战争结束以前成立。电文并表达了中国要求参加筹备会议的强烈愿望：“阁下和赫尔国务卿深切注意，中国必须参加此次会议，余更为欣慰。盖东方人民如无代表，则此次会议将对于世界之一半人类失去意义”。

这个被称为“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召开，也是分两段进行的。8月21日，美、英、苏三国先开会，由于三国在和平机构的组织原则上分歧较大，会议进行了一个多月，也未达成一致的协议。9月29日，美、英、中三国代表再开会。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是顾维钧等人。

中国政府为这次会议先后准备了5个方案，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对新国际组织的基本态度和对重要国际问题的主张。8月22日，在第一阶段会议开始的第二天，孔祥熙向英、美代表团团长分别送交了中国的方案。孔祥熙对此解释说：“此时我方尚未参加会议，本不必现送阅，唯因时间关系，我方如不事先表示意见，则英、美、苏一经决定，我方将无周旋的余地，不得不以密件方式送出，供其参考”。在第二阶段的会议中，中国代表团本着“全力促成会议成功”的精神，对国际组织宪章提出了积极的建议。10月9日，四国共同达成了建立国际和平组织的计划，并同时发表了计划的全文。这个计划包括7个部分：（一）全体大会；（二）安全理事会；（三）国际法院；（四）经济与社会理事会；（五）秘书处；（六）军事参谋委员会；（七）其他必要机构。

1945年2月4日至11日，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召开会议，讨论了“世界安全组织”的问题，将“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内容具体化，并制定了联合国会议的章程及具体办法：

1、讨论世界组织问题的联合国会议，应于4月25日星期三召开，并应在美国举行。

2、凡于1945年2月XX日（指雅尔塔会议闭幕时间）签字联合国宣言者，应为被邀请参加世界组织会议的仅有国家。世界组织原会员国名单应由会议决定。

3、外长会议已成立小组委员会，进一步研究有关世界组织建议之细节，并将于短期内向全体会议提出报告。

后来公布的“有关世界组织建议之细节”中，对安理会的组织程序有了明确的规定：安理会由11个会员国各派代表1人组成；以美、英、苏、中、法5国代表为常任理事，此外，联合国大会再选6个会员国为代表，充任非常任理事，任期2年，每年更换3国，都不能即刻连选连任。其投票权为：“（一）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均有一票投票权。（二）安全理事会中凡有关程序问题之决议，须有7个理事国投同意票，始得通过。（三）安全理事会中关于其它一切事项之决议，应有包括常任理事国在内的7个理事国同投同

意票，始得通过。”

这样，自 1942 年元旦的《二十六国宣言》提出“联合国”一词始，直到现在，联合国会议才进入了筹备召开的阶段。

国民政府自对日宣战时，即大力提倡战后成立国际组织，并把这一组织看成是中国成为强国的标志。2 月 14 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同意任联合国的邀请国。3 月 5 日，美英苏中四国（法国临时政府表示，因其未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仅作为联合国的参加国而不当邀请国）向 44 国发出邀请。

国民政府对这一会议极为重视。3 月 5 日，《中央日报》、《大公报》为此发表了社论，并介绍了大量的有关会议筹备的资料。3 月 7 日下午 2 时，国民党中宣部长王世杰在重庆举行记者招待会时强调：成立国际和平安全机构，“自与我国素来之主张相合”，“中国愿意以热烈合作的精神，增强这种国际合作之意志”。

当天，正在美国的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致电蒋介石，建议对联合国会议早作准备；并根据他对各国准备情况的了解，建议中国代表团应由宋子文为团长。

中国代表团人员的组成，国民政府很费了一番周折。根据雅尔塔会议确定的联合国大会参加国代表团的组成原则，中国代表团应当包括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而国民政府中除了顾维钧等人主张中共代表参加外，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其他人都极力反对。

中共方面积极争取代表资格。2 月 18 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致电美驻华大使赫尔利，要求中共派代表参加中国代表团。电文强调指出：“决不能仅由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参加会议”，“设若国民党独占代表名额，将不仅为不公平与不合理，并将表示他们的见地是要分裂中国”。此时，赫尔利正准备启程回国述职，于是致电周恩来返任后再协商。2 月底，周恩来再次致电已返美的赫尔利，催促其给予明确答复。赫尔利就此事请示罗斯福。罗斯福认为如果中国代表团中容纳其他党派的代表，可以加强中国的统一精神，对国民政府在全国的地位有利；况且，根据雅尔塔会议的精神，也没有理由拒绝中共的正当要求。3 月 15 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用很委婉的外交辞令表达了中国代表团应该包括中共代表之意：“余愿使阁下知悉，如阁下之代表团容纳共产党或其他政治结合或政党在内，余预料不致有何不利情形，实则此种办法有显著之利益，若能容纳此种代表，在会议中必能产生良好印象。”这样，国民政府才决定在代表团中容纳中共代表。

3 月 26 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中国政府今日已派代表 10 人，其中 6 人为国民参政员，即国民党以外之共产党及其他两反对党各 1 人，暨无党派者 3 人，《大公报》社长（胡霖）亦在其内。”中共代表的选定，经顾维钧提议，由董必武参加。

3 月 27 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布了中国代表团名单：

首席代表（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代理行政院长）。

代表： 顾维钧（驻英大使）
王宠惠（国民参政会主席团主席）
魏道明（驻美大使）
胡适（前驻美大使）
吴贻芳（国民参政会主席团主席）
李璜（青年党）

张君勱（国社党）

董必武（共产党）

胡霖（大公报总经理）

此外，还有顾问、专门委员会成员、秘书、随员等。中共党员陈家康、章汉夫，也以秘书身分参加代表团。

中国共产党反映了中国人民要求和平的意愿，自始就表示支持建立这一国际组织的计划。在中国代表团赴旧金山会议时，毛泽东同志在七大会议上所做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郑重宣布：“中国共产党对于保障战后国际和平安全的机构之建立，完全同意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所作的建议和克里米亚会议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欢迎旧金山联合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已经派遣自己的代表加入中国代表团出席旧金山会议，惜以表达中国人民的意志。”

46国代表团于4月25日到达旧金山。当天，中国代表团的6位成员发表讲话，董必武的讲话尤引人注目。他说：“我虽系共产党之一员，然系代表整个中国。中国代表团中包括各党各派，诚是极好的象征。会议之一切，系超越一切党派利益。”

4月25日下午4时30分，在布满46国国旗的歌剧场，有史以来的空前的国际盛会——联合国大会隆重开幕。中国代表团团长宋子文庄严地坐在大会主席台上。

各国代表经过两个月的充分讨论，制定出《联合国宪章》，50国（开会时又增加4国）代表团正式通过了这一国际法典。26日，各国代表在宪章上签字，中国是第一个签名的国家。

中国曾长期遭受侵略压迫，因而反对强权政治、强调国家平等、主权独立，是中国的一贯主张。在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主持公道，坚持正义。在会议讨论“托管领土”问题时，中国代表团主张，不仅应对托管领土加上“独立”的目标，同时对非自治领土也应加上有关独立的内容。虽然中国的主张遭到了英、美、法等国代表的激烈反对，但是，这一建议也引起了足够的重视，最后促使争论各方同意找出一个折衷的方案。在草拟这一方案时，为了让中国代表对自己的主张进行修改，美国代表竟专门到中国代表团驻地协商，并以美国打算建议在托管理事会中给予中国一个永久性的席位为说辞，使中国代表在草拟的文件中同大多数国家一致起来。对此，中国代表坦然相告，中国并不想在这一问题上为自己谋取利益，中国政府只是衷心希望把民族独立包括在联合国的基本目标之中，中国希望看到托管制取得成功。中国代表团这种为弱小国家伸张正义的立场和公正的态度，受到了与会者的赞扬，为会议的成功做出了很大贡献。

会议结束后，为筹备正式的大会，推举14个国家组成执行委员会，作为联合国正式机构成立前的过渡性组织，中国为其中之一。

10月24日，美国政府发表公报，宣布“联合国宪章业经中苏法英美及其它签字国过半数批准，定于是日起发生效力。1946年1月10日，联合国举行成立大会于伦敦。”筹备工作由此全面展开。

50年前倍受欺凌的中国，以世界强国的身分，走进了联合国。

七、苏联代表团愤然退出联合国议事厅， 不啻在世界扔下一颗炸弹。

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发表了《别了，司徒雷登》，为罗斯福使国民党政府所代表的中国“成为强大的国家”的努力画上了一个句号。

如果杜鲁门政府明智的话，本应从罗斯福梦想中清醒，冷静的对待以共产党为代表的新生的中国，但是它却采取了相反的做法，在军事上威胁、经济上扼杀的同时，主要是在政治上更大限度孤立中国。在它的操纵下，新生的中国被排斥在联合国之外。

中国为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开始了艰难的重返联合国的历程。

1949年10月1日，当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时，正值联合国第四届会议筹备召开之际，而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央人民政府却没有接到大会的入场券。

1945年6月26日，当中共代表董必武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时业已形成的国际关系准则承认，一个国家有权选择自己的政府，任何外国无权干涉。为此，1949年11月15日，周恩来外长分别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和四届联大主席罗慕洛，声明只有中央人民政府才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国民政府已经失去了代表中国人民的任何法律与事实的根据。因此，出席本届联大的“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绝对没有代表中国人民的任何资格。周恩来外长在声明中正式要求联合国，立即取消“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继续代表中国人民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利，以符合中国人民的愿望。1950年1月8日，周恩来外长又致电四届联大主席和联合国秘书长，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国民党集团代表留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是非法的，并主张将其从安全理事会中开除出去。

1950年1月19日，周恩来外长再次致电罗慕洛和赖伊，并请转达联合国及安理会各会员国代表团，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业已任命张闻天为中国出席联合国会议和参加联合国工作的首席代表。电文并请他们答复以下两个问题：(1)何时开除国民政府的非法代表团出联合国及其安理会；(2)以张闻天为首席的合法的中国代表团，何时可以出席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会议并参加工作。此后，李克农副外长、周恩来外长又先后致电联大主席和秘书长，通知中国政府又任命冀朝鼎为中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代表、任命孟用潜为出席托管理事会的代表，并继续要求联合国答复关于开除国民党集团的代表和合法的中国代表团何时出席会议并参加工作的两项问题。4月9日，周恩来专门召集会议，对中国代表团的组成进行详尽的研究，不但组成了50多人的代表团，而且还拟定了“派往联合国代表团办事机构编制、任务及干部配备草案”等具体规定。8月，当第五届联大筹备召开之际，周恩来外长再一次致电联合国秘书长，通知中国政府已任命张闻天为出席五届联大的中国首席代表，请他立即办理中国代表的入会的一切手续。

中国政府符合联合国宪章的正当要求，虽然没有得到联合国的答复，但是在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并进而影响到了错综复杂的国际舞台。

数年之前，为彻底消灭法西斯而并肩战斗的美国和苏联，在此时已分道扬镳，形成了各自为营的两大世界阵营。作为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后成长起来的新中国政府，它所奉行的“一边倒”（即倒向社会主义阵营）的外

交政策，自然是美国所不能接受的。美国像一个输光了的赌徒，总幻想有一天可以本利再收，依然把“国民政府”推到前台。当新中国政府提出重返联合国的要求后，美国自然要为此来设置重重障碍了。

截然不同是，苏联政府对于新生的中国最早给予支持，并为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付出了努力。1950年1月10日，苏联驻安理会的代表马立克在得悉周恩来外长8日的声明后，立即提出一项提案，要求安理会作出开除“国民政府”的决议，并郑重声明，在这项决议未做出之前，苏联将不参加安理会的工作。虽然苏联努力迫使国民党政府的代表蒋廷黻退出会议主席地位，但由于美国的阻挠，1月13日，这项提案未获通过。为表示抗议，苏联代表当场宣布：在“国民政府”的代表被开除之前，苏联将不参加安理会的工作，对在“国民政府”参与下安理会做出的任何决议都认为是非法的。随后，苏联代表团愤然地退出了安理会议事厅。

苏联的举动，犹如在安理会投下了一颗炸弹，马上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赖伊，首先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以当时的苏联在国际上的地位而言，它的退出，将意味着联合国的活动陷于瘫痪，而且，假如苏联另行组织联合国（这一点它完全可以做到），那就意味着联合国将处于分裂状态。赖伊必须尽快对此表明态度。3月8日，赖伊向联合国提出了一项关于“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法律方面的备忘录”。备忘录认为，“中国问题在联合国的历史上是独特的，这并非因为牵涉到一个政府的革命变递，而是因为第一次有两个敌对的政府并存着”。因此，对两个敌对政府并存的“中国”，联合国接纳代表的依据，是要看“哪一个在事实上据有使用国家资源及指导人民以履行会员国义务的地位”。赖伊在这里提出了一项重要原则，即要求把联合国代表权问题同任何一国政府是否承认新中国问题区别开来。为此，他建议召开由各成员国政府首脑或外长参加的安理会特别会议，讨论解决中国的代表权问题。3月10日，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什么政府应在联合国中代表中国问题”的声明，又进一步指出，必须尽快达成一项“关于什么政府在联合国中代表中国的决定”。为此，从4月22日到5月中旬，赖伊先后访问了华盛顿、伦敦、巴黎、海牙、日内瓦和莫斯科，对中国代表权问题进行调停和斡旋。赖伊的此次出访，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苏联对赖伊的行动给予支持，并表示将回到联合国；巴黎和伦敦也表示了支持的态度。在赖伊访苏期间，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与他进行了会谈。在出访结束后，赖伊向各会员国发公函，强调国际形势的严重性，而这一严重性“在中国代表权问题获得解决以前，要取得重大改进是不可能的”，呼吁国际社会重视这一问题。

望着苏联代表愤然退场的身影，美国也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倘若赖伊的忧虑成为现实，美国在世界的“老大”地位将会产生动摇。因此，驻联合国的美国代表格罗斯立即发表声明，一方面表示要对苏联的提案投反对票，另一方面又认为这是一个程序问题，对此不能行使否决权。当赖伊的备忘录提出的第二天，格罗斯又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评论：虽然美国政府反对北京政府在联合国占有席位的立场不变，但它将接受安理会多数票的决议。这就是说，美国不会把它的否决票算作是行使否决权，仍认为中国代表权问题是属于程序性事项。美国此举是在玩弄着进可攻、退可守的阴谋：既然承认中国代表权问题是程序问题，在确认这个程序的过程中，美国可以对此进行操纵，而一旦操纵失败，则可以将国民党政府当作“马前卒”加以抛弃。

对此，当时驻美的国民党政府大使顾维钧一语道破天机：“美国之所以认为是程序问题，显然是为了想留有活动余地，万一情况发生变化，美国在承认中共问题上需要改变政策的话，它便可以自由行动。”

顾维钧的担心绝不是杞人忧天，苏联退出安理会的举动，使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处于极度的恐慌和尴尬的局面。当赖伊的备忘录发表后，国民政府的代表第一次发表了与美国有歧异的声明，认为中国代表权问题并非像格罗斯所言的是个程序问题，而是属于实质性问题，并扬言要行使否决权，蒋介石也为此发来电文表示对时态的关注。顾维钧专门与蒋廷黻商讨对策，虽然他们都已看到“苏联、英国和赖伊都想以国民政府不复存在为理由，把我们排斥在联合国之外”这一事实，但他们仍然向蒋介石献策：“我们与其为了害怕最终肯定被驱逐而自动退出，不如顶住驱逐的浪潮并对其提出抗议。”也就是说，为了“不给中共进入联合国打开方便之门”，国民政府要困兽犹斗了。

苏联的行动无疑是对新中国的有力支持，并使各国更加关注中国代表权问题，但是它的退场，也失去了在安理会内就此进行协商和斗争的机会，因为随后安理会再也未形成提案和再辩论这一问题。此后，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国际关系的复杂化，赖伊也因对中国态度的变化而中断了斡旋活动，美国趁机在联合国施展手段，使本有可能解决的中国代表权问题陷于旷日持久的拖延状态。

八、艾德礼劝杜鲁门：“两张否决票与一张 否决票有甚么两样？会更坏些？”

1950年6月25日，处于当时“冷战”的世界局势的夹缝中的朝鲜，爆发了南北战争，美国在武装干涉朝鲜的同时，宣布用武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使得新生的中国硬被拖入了朝鲜问题的争端。这时，联合国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联合国难以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任何谈判。为此，作为中立于东西方两大阵营之外的印度进行了斡旋活动。

7月13日，尼赫鲁总理在事先征得中国的同意后，分别致信斯大林和艾奇逊，建议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由苏、美、英、中等国通过在安理会内外的谈判，和平解决朝鲜问题。7月16日，斯大林在给尼赫鲁的信中表示，苏联欢迎印度提出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安理会以解决朝鲜问题的和平倡议，而美国在7月18日则断然拒绝，导致斡旋活动搁浅。

这年9月，五届联大召开，印度代表再次作出努力，向大会提出接受中国参加大会的提案。苏联对此表示支持，并向大会提出两项决议草案：（1）大会议决国民党集团之代表并非代表中国，不得参与大会及大会各机关之工作；（2）大会议决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参加大会及其机构之工作。

但是，在美国的操纵下，印度和苏联的积极、公正地解决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提案，却遭到了大会的否决，反而通过了古巴所提出的所谓“联合国对会员国代表权的承认问题”的提案。该提案规定“如逢一个以上当局自称为有权在联合国中代表一会员国的政府，而此问题成为联合国中争论的题目时，该问题应按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及每一案件所处之情况予以考虑”，“当任何问题发生时，应由联合国大会考虑；如值大会休会，应由临时委员会考虑”，“对于这一问题大会或临时委员会所采取的态度，联合国各机构及各专门机构应予以考虑”。这一提案，实质上是把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问题，作为一个法律问题而强行拖延下来。此外，这次大会还通过了加拿大代表提出的“关于建立中国代表权问题特别委员会”的决议，规定成立一个由加拿大、厄瓜多尔、印度、伊拉克、墨西哥、菲律宾、波兰等7国代表组成的特别委员会，以审议中国代表权问题，但它所作出的决议却规定，在未作出结论之前，仍允许“中华民国”的代表出席联合国，并与其它国家的代表拥有同样的权利。这项决议，不但使印度和苏联的努力付之东流，而且意味着中国代表权问题将再一次被拖下去。

但是，这种拖延的局面已引起一些国家的反感，一直是美国行动的得力支持者的英国，在这一问题上倒是持冷静审慎的态度。这年的12月，美英在华盛顿的会谈中，艾德礼就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和台湾问题，向杜鲁门提出了忠告：

艾德礼：英国人不同情蒋介石，对所谓的福摩萨（即台湾）问题不感兴趣。美国应考虑从台湾海峡撤走第七舰队以换取中国从朝鲜撤军，并同时考虑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

艾德礼：台湾对美国远东防务是相当重要的，如把它交给敌人，美国的岛屿链条防线将会断掉一节。

艾德礼：台湾终归要还给中国人的，这是美国应该正视的现实。

艾奇逊：如果美国真想解决中国军队介入朝鲜战争这一问题的话，最好

让中国进入联合国。如果中国是联合国的一员，反而有达成协议的可能，因为在联合国内谈比在联合国外谈要好得多。这样，西方也可能少丢点面子。

杜鲁门：现在联合国有一个苏联已经让西方感到棘手，中共若进入麻烦将更多。况且，即使中共进入联合国，中美关系能否比现在更好？

艾德礼：即使中美关系不会比现在更好，两张否决票（指苏、中）与一张否决票有什么两样？会更坏些？

应该说，英国对美国的忠告是正视现实的，但是美国却对此置若罔闻。在会谈后的公报中表明，“美国现在反对并将继续反对中共代表在联合国的席位”。在1951年11月举行的六届联大上，美国以所谓“中国侵略朝鲜”为借口，操纵大会通过决议，“延期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并将这一决议延续达10年之久。

中国对美国的这种行为进行强烈的谴责。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周恩来外长即郑重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联合国应当成为保障世界和平及国际安全的组织，而不应当成为美国侵略的工具。美国政府认为中国人民选择了合乎中国人民的需要而不合乎华盛顿当局口味的人民民主制度，竟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得到它在联合国中应有的地位。但是许多重大国际问题，首先是亚洲问题，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是不能解决的。因此，联合国要真正有效地履行保障世界和平及国际安全的职责，就必须首先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外长在讨论关于朝鲜问题的发言中又进一步指出：“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者之一。中国人民一贯支持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并不断为它的实现而努力。根据联合国宪章，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和中国对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负有特殊的责任。联合国中的多数国家追随美国剥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应有的地位和权利，根本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并严重的损害着联合国的威信。”他进一步指出：“问题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求加入联合国，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联合国的应有权利遭受剥夺。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地位应予以恢复。”

与此同时，中国对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充满信心。到了60年代末，新中国经过坚韧不拔的斗争，已打破了美国从朝鲜、台湾和印度支那三个方面同时逼来的威胁，通过朝鲜停战谈判和日内瓦会议，稳定了南方边陲的局势。中国还同印度和缅甸共同倡导了举世闻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参加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亚非会议。这样，新中国不仅在惊涛骇浪的国际舞台上站稳了脚跟，而且在国际事务中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1957年11月，周恩来总理在对驻华使节的一次谈话中，在提到当时由印度提出的关于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的提案时指出：“我们很感兴趣的是，每次表决印度提案时，支持印度梅农先生提案的国家越来越多，有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其他友好国家。当然，在一个短时期，我们可以预料，像印度这样正义、友好的主张是不会在联合国通过的。……但是，每年表决一次印度式的提案，是值得做的正义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每次表决，赞成的国家越来越多，总有一天会由少数变成多数。世界上真理总是这样由少数变成多数的。事物发展规律就是这样，正义的东西总会取得多数的支持”。他还幽默地说：“这真叫做不懈的、不疲倦的斗争。”

在这种形势下，虽然美国依然老调重弹，却无法改变联合国成员国尤其是亚非国家对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支持。在1960年第15届联大上，表决美

国“延期”讨论的提案时，42票赞成，34票反对，22票弃权，仅以8票的微弱多数勉强通过。从投反对票和弃权票的国家总数已远远超出支持美国提案的国家这一结果看，如果到1961年第16届联大时，再来表决这一提案，恐怕美国连这一微弱的多数也难以保持。这就意味着美国强行阻止联大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老路子已经行不通了。虽然如此，美国依然不肯放弃它所扮演的“世界宪兵”的角色，一计不成又施二计，在中国通往联合国的道路上，又设置了新的障碍。

九、“双重代表权”：美国所玩弄的新花招

1961年，第16届联大总务委员会通过了讨论中国在联合国席位问题议题，这是对美国多年来阻挠联合国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的一大突破。但是，当时的新西兰为适应美国的需要，就中国代表权问题提出了一个提案。提案主张，根据联合国宪章第18条的规定，应把中国代表权问题作为重要问题，必须有2/3多数票赞成才能通过。这一提案，使美国捞到了阻挠中国恢复合法席位的救命稻草。于是，美国在程序上玩弄花样，串联日本、澳大利亚、哥伦比亚和意大利向大会提出所谓“重要问题”的五国提案，并为大会所通过。美国的这一花招，目的在于使它一旦处于少数地位时也可以继续阻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

对于美国挟持联合国采取的这一行动，中国政府表示严厉的谴责和强烈的抗议。在新西兰的提案刚出笼时，周恩来总理会见正在访华的英国蒙哥马利元帅时即就此发表谈话。他说：谁能代表中国6亿5千万人民？只有如你所说的北京的政府，而不是台湾的蒋介石。如果接受了美国、新西兰的设想，当做“重要问题”来讨论，那就讨论中国存在与否，这是干涉内政，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联大讨论的“重要问题”只能是国际问题，而不是一国内政。稍后，周恩来总理就此事发表讲话。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政府这样做的目的，仍然是为了继续阻挠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继续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保留在联合国内，为它制造‘两个中国’和长期霸占中国的领土台湾准备条件。”因此，他指出：“中国代表权问题，实质上就是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把窃据中国席位的蒋帮分子驱逐出去的问题，根本不是联合国宪章第18条第二款所指的重要问题。”

1961年9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美国这一新手法是完全违背联合国宪章的，因为宪章规定的‘重要问题’是指新会员国的加入、会员国权利的停止以及会员国的除名等，而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根本不属于上述范围之内；同时，宪章还明确规定不得干涉会员国的内政，而美国硬把中国代表权问题作为‘重要问题’，企图使已不能代表中国的国民党集团继续窃据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这实际上就是明显的干涉中国的内政。”12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也就此发表了声明。声明义正辞严地指出：“这个蹂躏联合国宪章、侵犯中国主权的决议，是完全非法的、无效的”，“美国继续挟持联合国，剥夺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丝毫不能损伤中国的国际地位，而不会使联合国的声名日益败坏，使美国在全世界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反对下，处于越来越孤立的地位”。

此后，虽然美国仍操纵大会年复一年的通过所谓的“重要问题”的提案，但是，联大表决恢复中国代表权的提案时，赞成票却逐年增多。在1965年第20届联大上，在大会仍然通过了所谓的“重要问题”的提案后，阿尔巴尼亚等10多个国家联合向大会提出了一项要求大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并承认它的代表为中国唯一合法的合法代表”的提案。在对这一提案进行表决时，47票赞成，47票反对，20票弃权，第一次出现了赞成票追上反对票的局面。到了1970年的25届联大，支持驱逐国民党代表的已达到51票，反对的已降到47票。这是自1950年联大表决恢复中国席位问题以来第一次赞成票超过反对票，它预示着美国在联合国内顽固推行的孤立中国的政策已走到了尽头。连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也不得不承认：“我认为，我们没有足

够的票数去阻挡接纳的时刻比我们预料的要来得快。”

尽管如此，美国仍困兽犹斗。1970年11月22日，尼克松口授给基辛格一份备忘录，指示他在秘密的基础上，组成一个研究班子，研究美国在“联合国接纳赤色中国的问题上将采取什么方针”。半年多以后，美国的一项企图在联合国内搞“两个中国”的政策出笼了。1971年8月2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发表了“关于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声明”，声明公然宣称：“美国将在今秋的联合国大会中，支持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入会的行动。同时，美国将反对任何排除中华民国剥夺它在联合国代表权的行动。”根据罗杰斯的这一声明，8月11日，美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乔治·布什向联合国秘书长吴丹递交了一封信和一份解释件的备忘录，正式要求把关于“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的议题，列入第26届联大议程，妄图继续阻挠联合国正确解决中国代表权问题。此后不久，尼克松政府又伙同日本佐藤政府向第26届联大抛出所谓的“双重代表权”案，即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进入联合国，但也“不剥夺中华民国的代表权”。

按照美国政府所打的如意算盘，“双重代表权”案既可实现其准备打开中美关系的政策，又可以保全国民党集团在联合国的席位。在这一方案出笼的同时，美国已准备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外交接触，“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这就意味着联合国内以美国为核心的那个反对新中国的所谓“传统投票集团”，也将难以继续保持。但美国却坚信，“双重代表权”案可达到稳定“传统投票集团”的目的。1971年4月，尼克松派资深外交官墨菲去台湾，把“双重代表权”案向蒋介石交底，并暗示说。只要与美国合作，台湾方面就可以保全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而且北京方面可能拒绝进入联合国。第26届联大开幕前夕基辛格还对台湾驻美“大使”沈剑虹许诺，即使“双重代表权”案获得通过，只要台湾方面留在联合国内不走，北京方面也会进入联合国，因为北京方面对把台湾驱逐出联合国，比对它本身进入联合国更有兴趣。当然，后来的事实证明，美国的如意算盘打错了。

针对美国这一要在联合国内明目张胆地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立即发表声明，声明严正指出：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坚持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类似的荒唐主张，坚决反对台湾独立的阴谋；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同驱逐国民党集团的代表出联合国，是一个问题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中国决不允许在联合国出现“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局面。声明认为，阿尔巴尼亚等国提出的决议草案中的一主张，是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唯一正确的合理主张。

十、联合国大会主席马利克说：“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1971年9月21日，第26届联大在纽约召开。提交大会讨论并要付诸表决的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提案有3个：（1）由阿尔巴尼亚等23国提出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驱逐出去的提案。（2）由美国、日本提出的所谓“重要问题”提案，提出要从联合国中取消“中华民国的代表权”的任何建议，都是属于宪章第18条中所规定的重要问题，需2/3的多数通过。为了与美国过去所提的“重要问题”提案相区别，这一提案又被称为“逆重要问题案”；（3）由美国、日本等19国提出的所谓“双重代表权”案，即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入联合国，但“确认中华民国继续拥有代表权”，并建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享有安全理事会国席位。

大会从10月18日开始辩论和审议中国代表权问题，到25日结束。大约有80个国家的代表在会上发了言，大多数国家的代表纷纷批评和谴责美国对华的错误政策，反对在联合国内制造“两个中国”。联大总务委员会充分尊重多数国家的意愿，9月22日通过的会议议程，把阿尔巴尼亚等23国的提案放在了美、日等国的“双重代表权”提案之前讨论，这就意味着美、日等国首先在程序的安排上遭到了失败。美、日等国虽然极尽拉拢之能事，但依然陷入孤立状态。

10月25日晚9时47分，大会进行表决。首先表决所谓“逆重要问题”提案，结果以59票反对、55票赞成、15票弃权被否决。当大会的电子计票牌上出现这一结果时，会议大厅顿时沸腾起来了，热烈的掌声持续两分钟之久，不少亚非拉国家的代表情不自禁“高声欢笑、歌唱欢呼”，“有的代表离开席位甚至跳起来”。接着，就表决阿尔巴尼亚等23国的提案。在表决之前，美国代表乔治·布什还企图作最后的挣扎，提议删掉23国提案中关于立即驱逐国民党集团代表出联合国的内容，但是，各国代表的异口同声的反对，以及大会主席印尼外长马利克顺乎民意的裁决，使布什的挣扎归于失败。经大会的表决，23国提案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获得通过。会议大厅里再次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在这种情况下，“双重代表权”案还没有来的及付诸表决就自动夭折了。20多年来美国所推行的孤立中国的政策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国民党外交部长周书楷率领的代表团眼见大势已去，被迫宣布退出联合国。

这就是联合国历史上著名的2758号决议。

2758号决议，使美国政界要人“感到痛苦”。美国代表乔治·布什在发泄这种痛苦时说：“我们在拉美、非洲、亚洲国家的联合国代表中的会外活动很紧张。……有一度，我们代表团计算，我们已获得取胜的票数，但在1971年10月25日，我们原以为向我们做了保证的一些代表，却弃了权；有些答应支持我们的代表没有参加会议”。在失败面前，虽然他也不得不承认：“这是联合国历史上的转折点，反西方集团（包括共产党国家）在美国威信动摇时第一次击败了美国”，“从长远来看，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打开与北京进行外交接触的渠道，其为明智之举，是很明显的”，但他对表决后一些代表在走廊上跳舞的场面还难以忍受，他认为，对这些代表来说，“台湾不是他们真正关心的事情，他们就是要踢山姆大叔一脚”。美国总统尼克

松在失败面前仍然难以自拔。他喋喋不休地说：“我们原以为最大的问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接纳而享有同等地位以后，劝说台湾仍旧待在联合国里”，可是，最后的结局却“比我们预料的要走得远得多”。10月27日，美国白宫发言人齐格勒所发表的一项声明中，将尼克松对此结局的真实态度表露无遗。声明中说，尼克松对表决后的那种“欢呼、鼓掌和舞蹈”的场面极为愤慨，并认为这是一种“毫不掩饰的高兴”和“个人仇恨”的“惊人表演”。

惨败的结局来得如此之快，使美国一些政界要人难以正视现实，因而有人把失败归罪于基辛格的第二次访华。当联大正要结束讨论和准备表决中国代表权问题时，基辛格也结束了在北京为尼克松的访华作准备的工作。尼克松当时指示基辛格在外面多待一天，不要正赶上在表决这一问题时回到国内。当基辛格的飞机刚从北京起飞，他就接到了联大的表决结果。遵照尼克松的指示，他在阿拉斯加停留了一天。当事后得知一些人对他进行责难时，他认为美国在联合国的失败，与其说与他访华有关，倒不如说“双重代表权”的立场“既笨拙又是自我拆台”更合情理，因为“问题的实质在于，友好国家改变了立场，他们当中很多国家长期来感到苦恼，一方面它们不愿同我们对立；另一方面讨好强大的中国又对它们有利。当美国对北京采取敌对态度的时候，它们害怕投票赞成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受到我们的某种处罚。现在我们戏剧化地要跟中国和解，它们就不再害怕这种惩罚了。因此，国务院要制订一项‘合理妥协’方案的全部努力，都毫无用处。”

1971年10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第26届联大的2758号决议发表声明。声明指出：“这次联合国大会投票的结果，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要求同中国人民友好的大势，同时，也说明一两个超级大国把自己意志强加给其他国家，操纵联合国和国际事务的蛮横作法，已经越来越没有市场”，因此，这是中国、“全世界人民和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的胜利”。声明宣布，中国即将派出代表团参加联合国的工作，并将同一切爱好和平和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站在一起，为维护各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为维护国际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的事业而共同奋斗。

11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姬鹏飞，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吴丹，中国已组成了以乔冠华、黄华为正副团长的出席第26届联大的代表团；同一天，姬鹏飞还通知吴丹，中国政府委派黄华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陈楚为副代表。

1971年11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次出席了联合国大会。当地时间上午10时30分，当乔冠华团长、黄华副团长和代表团代表符浩、熊向晖、陈楚走进会场，在中国席位上就座时，大厅内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许多友好国家的代表纷纷前来表示祝贺和欢迎。

大会主席、印度尼西亚的马利克首先致欢迎辞。他说：“我作为大会主席，非常高兴地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他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参加联合国组织的工作，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随后，57个国家的代表在会上致了欢迎辞。科威特代表亚洲国家说：“10月25日的夜晚发生了在联合国和国际大家庭的史册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联合国终于决定纠正了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错误。”他在阐述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地位 and 作用时说：“没有中国的参加，联合国就徒有虚名；没有中国积极性、建设性的作用，世界上出现的诸如裁军、国际安全、和平，特别是东南亚的和平等紧迫问题，就不能得到解决。”捷克代表苏联和东欧国家说：“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来到联合国，是为这个组织的活动创造更广阔的基础的一个决定性的前进步骤。”荷兰代表西欧国家说，现在联合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中国代表团的到来，“无疑将使联合国在处理我们所面临的重大国际问题时能有更大的权威。”布隆迪代表非洲国家说：中国代表回到联合国，“似乎是国际上新的力量均衡的黎明”。哥斯达黎加代表整个拉丁美洲国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联合国组织的工作和活动，可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基本目标，这就是在世界上建立公正的和持久的和平”，并将对联合国和整个国际大家庭面临的严重问题的解决，做出有意义的贡献。马来西亚代表东盟五国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它在联合国的席位对我们这个组织来说是一件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事件”。东道国美国代表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到来，“联合国将更能反映世界当前的现实情况，我们希望，他们的到来，将对本组织协调各国的行动的能力做出贡献”。

在各国代表致欢迎辞后，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在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中，登上联大讲坛，发表了重要讲话。他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衷心感谢许多联合国会员国坚持原则，主持正义，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做出的不懈的、卓有成效的努力，随后他阐述了中国政府对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的原则立场。他指出：中国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和种族主义，反对大国欺负小国，强国欺负弱国；国家不论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该成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准则，任何国家的事要由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来管，联合国的事要由参加联合国的所有国家共同来管。中国支持一切被压迫国家争取独立、自由、反对外来干涉、掌握自己命运的正义斗争，支持亚非拉国家维护民族利益、反对外来经济掠夺的斗争；中国要求裁军，特别是核裁军。

中国代表团恢复自己的合法席位后所阐述的主张，也就是中国后来在联合国各项工作中一贯坚持的立场。

11月23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出席了安理会会议，开始履行中国作为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的职责。黄华表示：“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安理会应当在维护国际和平，反对侵略和干涉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我们希望联合国宪章的精神能够得到贯彻。为此，我们将同一切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一道，为维护各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的主权，为维护国际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共同努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联合国各专门机构也根据联大的精神相继通过决议，恢复中国在这些机构中的合法席位，随后，中国陆续参加到联合国各机构的工作。

与此同时，国民党集团的非法代表被逐出联合国的主要机构。此后的数周之内，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之外，国民党集团的非法代表，也都被从联合国的附属机构和专门机构中一一逐出。数月之间，有20多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都与台湾断交。台湾当局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

时光如白驹过隙，从1945年至今，半个世纪的岁月又过去了。如果说前半世纪（1895—1945）是中国人民摆脱屈辱走向自立的时期，那么，后半世纪尤其是1949年10月以后，则是中国人民由自立到自强创造辉煌的时期。

度过了在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燕子低飞”的艰难时期后，中国的外交迎来了“凯歌行进”的大好形势，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所付出的努力——

被誉为国际关系重要准则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为联合国指导建立新型的国际关系，树立了光辉的典范。邓小平创造性的“一国两制”的构想，成功地解决了半个世纪前无法解决的香港、澳门回归祖国的问题。如今，中国改革后所带来的经济腾飞，已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美国人在 100 年前所发出的“谁了解中国谁就可以执世界 500 年政治之牛耳”的感叹，已越来越成为世人有目共睹的现实。

在纪念中国走进联合国 50 周年之际，我们不由得想起了 50 年前为联合国的缔造付出过辛勤努力的罗斯福。如果他在世，目睹了当今中国在国际上的重要作用，也一定会发出 50 年前同样的感叹：“假如没有了中国，假如……”

